

十三經注疏校勘記

四

北京大學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劉玉才 主編

十三經注疏校勘記

北京大學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目錄

整理說明	一
儀禮注疏校勘記序	一
儀禮注疏校勘記卷一	一
儀禮注疏校勘記卷二	四一
儀禮注疏校勘記卷三	七一
儀禮注疏校勘記卷四	八〇
儀禮注疏校勘記卷五	一〇四
儀禮注疏校勘記卷六	一四三
儀禮注疏校勘記卷七	一六七
儀禮注疏校勘記卷八	二〇三
儀禮注疏校勘記卷九	二七一
儀禮注疏校勘記卷十	二八七
儀禮注疏校勘記卷十一	三〇五
儀禮注疏校勘記卷十二	三七一
儀禮注疏校勘記卷十三	四〇三

儀禮注疏校勘記卷十四	四四七
儀禮注疏校勘記卷十五	四七四
儀禮注疏校勘記卷十六	五一三
儀禮注疏校勘記卷十七	五三七
儀禮釋文校勘記	五六七

儀禮注疏校勘記

〔清〕

張	徐	阮
文	養	元
整	原	
理	分	總
	校	纂

整理說明

儀禮注疏校勘記十七卷，附釋文校勘記一卷，原題阮元撰、徐養原校字。徐養原（一七五八—一八二五），字新田，號飴庵，浙江德清人。嘉慶六年（一八〇一）副貢生。少隨父宦遊京師，從一時名宿問業，洞曉學術源流。長而家居誦讀，潛研經訓，學問益深通博洽。邃於經學，尤精三禮，於明堂、禘祫、廟制、郊社、井田等皆有論說，並考辨聲律、樂器、歌詩、地理及考工記諸制，著成頑石廬經說十卷。又著周官故書考四卷、儀禮古今文異同疏證五卷、春秋三家異同考一卷、論語魯讀考一卷，另有經學、小學、音律、天算及詩文論

著多種。阮元撫浙之時，延人謁經精舍，參與纂修十三經注疏校勘記，分任尚書、儀禮。嘉興錢儀吉嘗述人言，謂養原「經爲人師，行爲儀表」（衍石齋記事稿卷十徐新田墓誌銘），可見其學行之醇篤。清史列傳卷六九有傳。續碑傳集卷七十二載張履所撰徐飴庵先生傳。

一、儀禮注疏校勘記所據版本及刊刻源流

儀禮注疏校勘記卷首詳列引據各本目錄，其中所據版本依次爲唐石經、宋嚴州單注本、翻刻宋單注本、明鍾人傑單注本、明永懷堂單注本、宋單疏本、李元陽注疏本、國子監注疏本、汲古閣注疏本、國朝重修國子監注疏本。儀禮存世版本較多，版刻源流較爲複雜，爲充分揭示校勘記的

撰著背景及內容特點，茲參據張麗娟宋代經書注疏刊刻研究、顧永新經學文獻的衍生和通俗化、汪紹楹阮氏重刻宋本十三經注疏考、喬秀岩儀禮單疏版本說、廖明飛儀禮注疏合刻源流考等相關成果，分別經注本、單疏本、注疏本等門類，擇要簡述其主要版本及傳刻源流如下。

經注本：

五代監本既爲儀禮刊板之始，也是經注本之源頭，兩宋監本又先後相承，爲儀禮經注本之主流。在此監本系統之外，還有多種官刻及坊刻之本。由於年代久遠，宋刻諸本大都亡佚無傳，今惟可據張淳儀禮識誤知其大略。南宋乾道年間，温州太守曾逮刊刻儀禮經注，邑人張淳爲之校訂，乃哀集所校之字，而有儀禮識誤之作。其自序敘所據各本及版刻源流云：「此書

初刊於周廣順之三年，復校於顯德之六年，本朝因之，所謂監本者也。而後在京則有巾箱本，在杭則有細字本。渡江以來，嚴人取巾箱本刻之。雖咸有得失，視後來者爲善。此皆淳之所見者也。淳首得嚴本，故以爲據，參以群本，不足則質之疏，質之釋文。疏、釋文又不足則闕之，蓋不敢以謏見斷古經也。監本者，天下後世之所祖。巾箱者，嚴本之所祖。故其有誤，則亦辨之，餘則採其所長而已。」按儀禮識誤實際所引據，除自序所云監本、巾箱本、細字本、嚴本外，還有湖北漕司本。此後很少有儀禮的刊刻記載，諸如南宋撫州公使庫所刊九經、興國軍所刊六經、余仁仲萬卷堂九經、廖瑩中世綵堂九經，以及後來相臺岳氏九經三傳，其中皆無儀禮。

傳世儀禮經注本以嚴州本爲最早，乃

南宋初期嚴州人據汴京巾箱本重刻。在張淳之後，嚴州本不見記載，數百年隱而不彰，直至清乾隆末年，吳中藏書家黃丕烈得到一部經注本，無刊刻時地標識牌記，顧千里證諸張淳儀禮識誤，考定其爲

宋刻嚴州本，由是此本重現於世。嘉慶十九年（一八一四），黃丕烈又影刻此嚴州本，對原本行摹款仿，字體筆畫、刻工諱字皆仍其舊，即有文字舛誤亦不擅改，而別爲校錄附於書後，意在「存嚴刻之舊面目」。黃氏所藏原本後來不知踪跡，然其影刻本大致可傳原本之真。嚴州本之外，儀禮經注本以徐本最爲著名，相傳爲明嘉靖間東吳徐氏所刊三禮之一。徐本間避宋諱「敬」字，乃據宋本覆刻之證，而其文字多與嚴州本相合，兩者必有版本傳承關係。顧千里跋此本云「此正從嚴州本出，

與宋槧未達一間耳」，校勘記引據各本目錄謂其「祖嚴本而稍異」，據此則是徐本源出嚴州本。萬曆間鍾人傑又據徐本重刻，是爲鍾本，校勘記引據各本目錄謂其「全同徐本，其偶異者，是失於讎校也」。

在上述經注本之外，還有數種經注附釋文本。如前所言張淳所校、曾逮所刊之本，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及魏了翁儀禮要義皆引其異文，謂之溫本，校勘記中亦間接述及。溫本雖已無傳，然據儀禮識誤所載釋文誤字，可知其附有經典釋文，是今所知最早的經注附釋文本。明正德十六年（一五二一），陳鳳梧在汴中刊儀禮十七卷，亦爲經注並附有釋文，其特點是經注文字多取正於朱子儀禮經傳通解，所附釋文亦直接錄自朱子通解，而非依據陸氏經典釋文，故缺略之處甚多。又崇禎間金蟠、

葛肅所刊永懷堂本十三經古注，其中儀禮十七卷，亦附釋文，校勘記引作葛本。永懷堂本蓋據閩本十三經注疏刊刻，實源自注疏合刻本系統，校勘記引據各本目錄謂其「全與閩刻注疏本同」，故其校勘價值有限。

單疏本：

自宋太宗端拱元年（九八八）至真宗景德二年（一〇〇五），北宋國子監先後校定刊行五經正義、七經疏義。玉海卷四十二「咸平校定七經疏義」條載：「景德二年（六月庚寅，國子監上新刻公穀傳、周禮、儀禮正義印板。先是，後唐長興中，雕九經印板，而正義傳寫踳駁。太宗命刊校雕印，而四經未畢。上遣直講王煥就杭州刊板，至是皆備。」此為儀禮單疏刊板之始，即後世所謂北宋景德官本，南宋時期又曾覆刻此本。宋刻儀禮單疏在清代尚

有一部傳世，乾隆末年為黃丕烈士禮居所得，黃氏卒後又歸汪士鐘。道光十年（一八三〇），汪氏藝芸書舍乃據原本影寫重雕，行款版式及刻工姓名悉仍其舊，顧千里為作代序和後序。汪氏之後其原本已不知所在，然據此影刻本可知原本面目。其原書為五十卷，闕卷三十二至三十七，而士冠、士昏、士相見、鄉飲、聘禮、特牲、少牢七篇間有闕葉，每半葉十五行，每行二十七字，各卷尾題後有字數，卷末題有景德元年校定諸臣銜名，正經注語皆標起止，而疏文列其下。顧廣圻、黃丕烈等據其卷末題銜，皆以此本為北宋景德原刻，校勘記亦沿襲其說。然據其刻工有南宋初期杭州地區刻工，亦有元代刻工，可知其原本當為南宋覆刊之本，後來又有修補。此外又有黃氏士禮居影抄本，乃據黃

氏所藏原本影抄，今藏國家圖書館。又有日本宮內廳書陵部所藏舊鈔單疏殘卷，存卷十五、十六，汪紹楹謂其「書法潦草，訛字亦不少，然體式猶存單疏面目」。據喬秀岩研究，其底本乃宋刻單疏十五行本，且較士禮居藏本刷印爲早。

注疏本：

經書注疏合刻大概始於南宋，然儀禮合刻則遠在於後。遲至明正德間，南監十三經尚無儀禮注疏，而以楊復儀禮圖代之。嘉靖初年，陳鳳梧將單疏附於經注，編校刊行儀禮注疏十七卷，乃注疏合刻之始，是爲陳本。在嘉靖間還有另外兩種儀禮注疏單行刊本，一爲汪文盛、高澂、傅汝舟校刊，行款與陳本相同，當據陳本翻刻；一爲直隸學政聞人詮校正，常州知府應槓刊行，乃據陳本重刻。陳氏板片後歸

南監，嘉靖中李元陽在福建校刊十三經注疏，儀禮即因此本，是爲閩本。萬曆中北京國子監據閩本重刻，是爲北監本（校勘記省稱監本）。崇禎中毛氏汲古閣又據北監本重刻，是爲毛本。汪文盛本、聞人詮本與陳本皆傳布不廣，不及閩本、監本、毛本通行。清康熙間，對北監本板片又有校訂修補，校勘記所謂「國朝重修國子監注疏本」是也。乾隆四年（一七三九），武英殿又據監本重新編校，並附周學健等所撰考證於後，是爲殿本。上述諸刻輾轉相承，皆附有釋文，爲十七卷之形態。黃丕烈百宋一廬賦注所謂「陳鳳梧、李元陽、聞人詮散疏入注，而注之分卷遂爲疏之分卷」是也。嘉慶十一年，張敦仁重新校刊儀禮注疏，其經注取正於宋刻嚴州本，疏則採用宋刻單疏本，單疏所闕

六卷則依儀禮要義。其特點是以經注散附於疏，故沿用單疏本之卷第，全書爲五十卷，仿十行本之版式，而不附釋文。後世流傳的儀禮刻本，以嚴州單注本及宋刻單疏本最古，亦最爲精善，而張敦仁刊本以之「雙美合璧」（黃丕烈語），又得顧千里精加讎正，遂成「此經注疏之最善者」（曹元弼語）。嘉慶二十年，阮元在江西主持重刊十三經注疏，其於儀禮雖自言「借校蘇州黃氏丕烈所藏單疏」重刻，實則出於覆刻張敦仁刊本。儀禮注疏合刻本之源流大略如此。

二、儀禮注疏校勘記的內容特點及價值意義

嘉慶六年，阮元在西湖立詒經精舍，

延攬學人校勘十三經注疏。由此上溯十年，在乾隆五十六年冬十一月，阮元奉旨充石經校勘官，分校儀禮十七篇經文上石，乃「總漢石經殘字、陸德明釋文、唐石經、杜佑通典、朱熹經傳通解、李如圭集釋、張淳識誤、楊復圖、敖繼公集說、明監本、欽定義疏、武英殿注疏諸本以及內廷天祿琳琅所收諸宋元本、曲阜孔氏宋本，綜而核之，經文字體擇善而從」，於次年六月撰成儀禮石經校勘記四卷（阮元儀禮石經校勘記序）。焦循謂阮元校勘石經時「臚列諸本，反覆經義，審擇得平，兼又博訪通儒，務從人善」，於戴震、劉臺拱、王引之、金榜之說皆有採擇，於錢大昕、王念孫「亦曾執手問故」；且謂阮元「又有校正鄭注賈疏冊記，考證益精，俟更刻以傳焉」（焦循儀禮石經校勘記後序）。據之可知，

在正式撰作十三經注疏校勘記之前，阮元不但撰成儀禮石經校勘記，還曾全面校勘注疏文字，且似已經成編。有此前期準備和基礎，儀禮注疏校勘記較之其他各經校勘記為特殊。而阮元校勘儀禮石經，則廣泛參據各種版本，充分吸收前賢時彥論說，用力可謂勤且至矣。儀禮石經校勘記與後來儀禮注疏校勘記之關係，據經室集一集卷二儀禮石經校勘記序所附阮福案語云：「在浙定十三經注疏校勘記時，此記皆採載彼本矣。」今以二書詳加比勘，因其出校範圍有別，前者僅校經文，而後者則全面校勘經、注、疏文以及釋文，彼此內容份量大相懸殊。專就經文部份來看，儀禮石經校勘記有些出校條目為儀禮注疏校勘記所無，而就相同出校條目而論，兩書引徵文獻和論說考辨亦存在較大差異，

甚至持論截然相反。在引據版本、徵考文獻、校勘理念諸方面，後出的儀禮注疏校勘記顯然更為精密完善。可見兩者之關係並非阮福所言「此記皆採載彼本」如此直截簡單，然而不可否認，阮元早年校勘石經的實踐經歷和考證成果，為後來撰作校勘記提供了良好學術積累，並奠定了堅實文獻基礎。

儀禮注疏校勘記的主要內容是版本對校，蒐羅版本較為完備，而在所引各本之中，尤為推重唐石經、嚴州本及單疏本之價值。阮元儀禮注疏校勘記序云：「大約經注則以唐石經及宋嚴州單注本為主，疏則以宋單行本為主，參以釋文、識誤諸書，於以正明刻之訛。」從版本源流來看，後世經注本皆源出五代監本，而監本經文即據唐石經，故唐石經被稱為「古本之終」，

今本之祖」，爲「天地間經本之最完最舊者」(嚴可均唐石經校文敘)。清代學者從事儀禮校勘，頗得力於唐石經。而嚴州本則爲唯一傳世的宋刻經注本，張淳昔日校定儀禮，即以此本爲據，稽考儀禮識誤所載異文，可知在其所見諸本之中，嚴州本校刻精審，雖不無舛誤，然勝諸本之處實多，堪稱宋刻之佳者。如顧炎武所言「監本脫誤之處，嚴州本皆完然具存；顧千里以嚴州本校經注，「補正注文者尤不可枚舉」(黃丕烈百宋一廬賦注)，「視嘉靖本尤勝」(顧千里重刻儀禮注疏序)。至於宋刻單疏本，則更具無可替代之重要價值，以其未經後人刪改更易，較好保存了賈疏的本來面目。顧千里跋單疏本云：「此宋時官本疏，分卷五十，尚是賈公彥等所撰之舊。不佞在士禮居勘之一過，於行世各本，補

其脫，刪其衍，正其錯謬，皆不可勝數。其所標某至某、注某至某，尤有關於經注，而各本刊落竄易殆盡，非此竟無由得見，實於宋槧書籍爲奇中之奇，寶中之寶，莫與倫比者也。」(思適齋書跋卷一)再就明刻注疏本而論，其源頭爲陳鳳梧刊本，陳氏則是依據自己先前所刻經注本，並附入單疏內容合刻而成。陳氏經注本多取正於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在附入疏文時又率意牽合，並據通解對疏文多有刪改更易，加之校勘不精，以致經、注、疏文多有舛訛脫衍。其後閩本、監本、毛本諸刻輾轉相承，沿謬踵訛，舛錯彌盛。阮元儀禮注疏校勘記序議明刻注疏之失，謂「朱子作通解，於疏之文義未安者多爲刪潤，在朱子自成一家的書，未爲不可，而明之刻注疏者一切惟通解之從，遂盡失賈氏之舊」。即此可

見校勘記以唐石經、嚴州本及單疏本爲主，實具有正本清源之性質，能徹底釐清陳本以下諸刻疏失，從而實現「以正明刻之訛」、「庶還唐宋之舊觀」的目的，與同時問世的張敦仁重刊儀禮注疏交相輝映，在版本學和校勘學上具有大致相同的價值意義。

在版本對校之外，儀禮注疏校勘記還廣泛徵引他校文獻，充分吸收前人校勘成果。如其卷首引據各本目錄所列，則有陸德明經典釋文、張淳儀禮識誤、李如圭儀禮集釋、朱子儀禮經傳通解、魏了翁儀禮要義、楊復儀禮圖、敖繼公儀禮集說、浦鏜十三經注疏正字、盧文弨儀禮詳校、顧炎武九經誤字、張爾岐儀禮誤字、彭元瑞石經考文提要。此爲其所引據主要文獻，其中陸氏經典釋文既標注漢魏六朝聲讀音

切，又兼載諸儒訓詁與各本異同，可據以考見陸氏所據底本與唐前古本之面目。張淳儀禮識誤乃儀禮校勘肇端之作，既校正經注文字之訛脫，亦存有宋槧諸本之崖略。李如圭儀禮集釋則取鄭注而博採經傳以釋之，多發賈疏所未備，以其生於南宋，故得參用古本，可訂注疏本之訛。朱子儀禮經傳通解以儀禮爲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所載相關內容以附之，全載經注而節錄賈疏，對注疏文字雖多有改易刪潤，然精確之處亦復不少。魏了翁儀禮要義分別條目事類，節取注疏之文錄於其下，有刪節而絕無改竄，卷第悉依賈疏原本，文字也多與單疏相合，單疏所闕之六卷，可藉此以見大略。楊復儀禮圖全載經文而節取注疏，詳考儀節陳設方位而繫之以圖，所載注疏文字亦不無佳處。敖繼公儀

禮集說解經多與鄭玄立異，於經文間有輕率臆改，所載鄭注亦多移易點竄，然精要之處亦不可沒。至於顧炎武九經誤字、張爾岐儀禮誤字、彭元瑞石經考文提要，則是清人考訂唐石經的重要成果。浦鏜十三經注疏正字爲前此群經校勘代表性論著，而盧文弨儀禮詳校則是儀禮校勘專門之作。有些文獻雖未列入上述目錄，但實際上仍有大量引用。如引通典近兩百處，引聶氏（聶崇義三禮圖）八十餘處，引周學健（殿本儀禮注疏考證）二十餘處，又據盧氏詳校引金曰追（儀禮經注疏正訛）二十餘處。此外還引述衆多清代學者之說，如臧琳、沈彤、惠棟、戴震、錢大昕、程瑶田、段玉裁、凌廷堪、瞿中溶、顧廣圻、嚴杰、臧庸諸家。綜而論之，儀禮注疏校勘記利用他校文獻極爲完備，彙集諸家論說較爲充

分，前此重要的研究著作以及校勘成果基本囊括無遺。

儀禮文辭古奧難讀，歷來傳授研習者少，至後世不立於學官，學者益不復誦習，故其版本校勘疏略，文字多有舛誤。清初顧炎武以唐石經校明監本諸經，發現儀禮脫誤最甚，開清人儀禮校勘之先河。其後儀禮研究漸盛，出現了衆多考證成果，對於校勘也頗有助益。阮元身處乾嘉學術鼎盛之時，得以取精而用弘，博考而詳辨。阮元儀禮注疏校勘記序云：「鄭注疊古今文最爲詳覈，語助多寡，靡不悉紀。今校是經，寧詳毋略，用鄭氏家法也。」因此種種緣由，儀禮注疏校勘記的內容頗爲詳贍。前此專門從事儀禮校勘者，還有金曰追儀禮經注疏正訛、盧文弨儀禮注疏詳校。金氏正訛所據以朱子通解爲主，輔以

楊氏儀禮圖、敖氏儀禮集說，並參考沈彤儀禮小疏、馬駟儀禮易讀，其參校版本則有陳鳳梧、鍾人傑兩經注本。盧氏詳校引證多本於武英殿本和儀禮義疏，並參據陸德明以下至近世十餘家之說，對浦鏜正字、金曰追正訛等均有利用。兩家蒐羅版本俱不完備，故論者謂金氏正訛「未見宋元各舊本，根據薄弱，遠不逮盧文弨詳校、阮元校勘記之精」，盧氏詳校則「景德單疏本未見，魏了翁要義雖見而未細考，故其書勝正訛，而遠不逮阮元校勘記」（胡玉瑨儀禮經注疏正訛跋、儀禮注疏詳校跋）。而儀禮注疏校勘記則對金氏、盧氏之書亦有參考，並能後來居上，卒集儀禮校勘之大成。儀禮注疏校勘記自成書之日起，就已廣為流傳，產生較大學術影響。如胡培翬撰著儀禮正義，凡涉經注校勘必引阮元

校勘記，所引將近千條之多，在所據文獻中居於主要。曹元弼謂「國朝禮家校勘以阮氏為宗」（禮經學流別第七），洵非虛譽。

儀禮注疏校勘記也存在一些疏失和不足。如校勘記所引版本以嚴州本和單疏本最為重要，但引據各本目錄謂嚴州本是「元和和顧廣圻用鍾本校其異者書於簡端，今據以採入」；至於單疏本雖未明言所據是否為原本，然黃丕烈、宋嚴州本儀禮經注精校重雕緣起云：「宋刻經注本及宋刻單行疏本，各校副本，流傳於外，阮芸臺侍郎取以入儀禮校勘記中者是也。」又據顧千里思適齋書跋卷一「儀禮要義」云：「中丞阮公將為十三經作考證一書，任儀禮者為德清徐君新田，新田與九能有婣親，曾傳鈔是書，近日復從予所持舊校景德本去臨出一部。」是知阮、徐撰作校勘記時，其

實未嘗親見嚴州本和單疏本，而是據顧千里校本輾轉校錄。顧氏校勘雖稱精密，學識誠爲卓絕，然千慮之失固所難免，故校勘記雖以嚴州本、單疏本爲主，但不能全面準確反映其原貌，且存在失校誤校之處。後來胡培翬著儀禮正義，在引用校勘記之時，多據士禮居重刊本補出嚴州本異同。曹元弼所撰禮經校釋，亦覆覈士禮居重刊嚴州本和藝芸書舍重刊單疏本，很多條目可補校勘記之闕失。至於其他方面的疏失訛誤，則汪文臺十三經注疏校勘記識語、孫詒讓十三經注疏校記亦有辨及。而今人王輝撰阮元儀禮注疏校勘記補正，彙集阮元校勘記之疏失和阮刻儀禮注疏之訛誤，爲之補正凡二百餘條，頗有詳確可據之處。若能以阮元儀禮注疏校勘記爲基礎，全面參核覆校今存各種重要版

本，充分吸收諸家糾謬補正之成果，並參考利用後來所出武威漢簡、漢石經殘石等文獻資料，必定能彌補校勘記的疏失和不足，從而推進和提升儀禮注疏的校勘水平。

三、儀禮注疏校勘記的單行版本與印本差異

十三經注疏校勘記單行版本主要有二，先有阮氏文選樓刊本，後有學海堂刊清經解本。十三經注疏校勘記的成書及初刻時間，張鑒雷塘庵主弟子記有明確記載，當爲清嘉慶十一年冬十月，是刻即所謂文選樓本。嘉慶十三年八月，段玉裁撰十三經注疏釋文校勘記序，今所見文選樓本多將此序置於卷首。嘉慶廿一年十二

月，阮元經過反覆校改，又將此本敬裝十部，具表進呈御覽。道光九年廣東學海堂編刊皇清經解，十三經注疏校勘記收入其中，是爲學海堂本。學海堂本書板後因戰火多有殘毀，故在咸豐十年（一八六〇）又予補刻，補刻板片版心下方皆鐫「庚申補刊」，是爲庚申補刊本。我們通過版本調查，發現文選樓本前後印本之間存在差異，其中尤以尚書、儀禮爲甚。關於尚書注疏校勘記的印本差異，詳見其整理說明，茲不贅述。今專就儀禮注疏校勘記作以考述，先敘所檢覈文選樓各印本相關信息如下。

1. 南京圖書館藏本。著錄爲十三經注疏校勘記二百四十五卷，清嘉慶廿一年揚州阮氏文選樓刻本。續修四庫全書據之影印，卷端題「本書據南京圖書館藏清

嘉慶阮氏文選樓刻本影印」，是目前較爲通行之本。有隸書牌記「宋本十三經注疏校勘記二百十七卷增釋文校勘記廿六卷」，卷首有嘉慶戊辰（一八〇八）段玉裁序。（簡稱「南圖藏本」）

2. 上海圖書館藏本（索書號：線善T417004—63）。著錄爲宋本十三經注疏併經典釋文校勘記，清嘉慶十一年儀徵阮氏文選樓刻本，前有楷書牌記「十三經注疏校勘記 / 揚州阮氏文選樓藏板」。又有題識云：「凡例內所夾一簽似唐鵬庵手書。 / 儀禮缺卷補鈔極工整。丙子年以廉價得於上海城內書攤，乙卯年重裝訖。揆初記。」知其爲葉景葵舊藏。其中儀禮卷一至八抄配，卷九至十七原刻。（簡稱「葉景葵舊藏本」）

3. 上海圖書館藏本（索書號：線普